



近代中國革命之發展過程及其背景

實 君

一 叙言

最

近半世紀以來的中國，是激劇轉換的中國，亦是革命潮流繼續高漲的中國。中國革命到現在雖然還未

成功，我們不能作最後的決算；但革命意識之彌漫人心，革命勢力之擴大到下級民衆，是很明顯的事實。同時，就客觀條件的觀察，世界革命潮流之邁進，社會革命，及民族運動之抬頭，與其相對的國際帝國主義發展到「第三期」而垂於沒落；中國社會矛盾之對立銳化等等，無非反映中國革命，將轉變到一新時代，而博得最後最大的成功。

處在過渡的艱難困苦而沒有獲得解放的中國民衆，關於

中國革命前途之方向若何？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；然而要求得這個問題的解答，首先須把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，加以明白的認識。因為一切社會現象，決不是前無因後無果，偶然發現的。過去的一切，是將來的一切之延長；將來的一切，是過去的一切之結果。我這篇文章的主要意義，即是把過去中國革命加以概括的分析。

但是中國舞台的歷史劇，決不是從最近數十年可以截斷，我們要明瞭將來（包括現在），而回溯過去，差不多要算一回歷史總賬，這是一部擴大的廿四史，將從何處說起呢？不過所謂革命的意義，是專指着社會變革——或政治變革來說的。而中國革命——如果不把那「改朝換帝」算在裏

面，則真正的「革命」，不得不說在中國最近數十年中，才開始發現。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，長期停頓在封建的宗法制度，與封建貴族統治之下；而歷史上「改朝換帝」，僅變更了其形式，而沒有變更其內容。所以當我們要研究中國革命史時，無須乎把這些事實，包括在裏面。

中國歷史上，除開最近幾十年，沒有真正的革命，當然歸結於中國社會的物質條件，沒有顯著進步；換言之，即是沒有建築起代替封建宗法制度的條件。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度的起源及其變革，我們沒有具體可靠的材料。原始共產社會這一個階段，更不可考。所剩下來的，只有從周末起以後數千年的這個封建宗法社會的長期遺留。

在秦始皇時代，中國的封建制度，表面上似乎起了一個變化——廢封建為郡縣，均權的改為集權的；——而商人資本、及高利貸、手工業等這些「前期資本主義」(Frühkapitalismus)的成份，在周末已經存在；甚至連商人行會(Mes hant guild)和手工業行會(Craft guild)的發現，也不是近代的事。所以許多人認為中國封建制度，已從秦始皇時代消滅的主張，覺得確鑿可信。然而中國為什麼還遲遲沒有發現產業革命，和工業資本主義 (Industrikapitalismus)——一直要等到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以後，變做半

殖民地，而不自己去做國際天字第一號的先進的帝國主義？尤其是經過研究了「亞細亞的特殊生產方法」以後，更可以明瞭秦始皇時代的變化，僅是形式的，而非實質的。至若商人資本、高利貸之發現，不但不能證明中國資本主義，早已發達；而且因牠們超過生產資本之過早和過高的發達，自成獨立生產者。因此吮吸了生產資本生產的血汗，而不能助長生產資本的生產。是牠們自身，正成為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東西，與封建式的剝削，同樣是妨害中國手工業者及農民等生產之發展。

中國的封建宗法制度，既不為那些「前期資本主義之寄生資本所崩壞，自然所有「改朝換帝」，「易世革命」的把戲，只算一種政治上——統治者人的更換，而不是政治的質的變革，尤其不是社會的變革，如果說這是革命，很是不妥當的。

因此，我們研究中國的革命，只有從最近幾十年起；因為，最近幾十年的中國，經過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入，才在政治方面、經濟方面、文化方面、社會方面等，與此以前的中國截然不同。而中國革命，亦因這個原故，逐漸萌芽、成長、爆發，以至於有今日。

自然我不是說中國近代的革命，是憑空而來，偶然突發

的。牠少不得有其歷史背景，和社會根據。爲說明起見，不得不徵引往古的事實；不過最有關的還是近代的事實。所以我這篇文章，無論是敘述中國革命過程，或是分析中國革命背景，都是以近代中國的歷史作對象，這是應事先聲明的。

二 西歐資本主義之東航與鴉片戰爭

滿清政府因襲着繼承着統治這個長期停頓在封建宗法制度的中國，已垂二百餘年。一切社會的與政治的現象，猶是一個中世紀封建大王國，並沒有什麼變化。但以西歐資本主義之東航，來叩遠東唯一大帝國的大門；活潑冒險，而蓬勃的具備無限慾求，與新的活力的資本家及其先驅（教士），挾其「堅甲利兵」，和經濟的、文化的、政治的力量，儼如排山倒海而來，使閉關主義，和封鎖政策的中國，如摧枯拉朽。在中國海禁未開以前，雖然葡萄牙的商船，曾在明末以前，照顧中國東南沿海，要求通商。但這個時代，葡萄牙是一屆中世的商業資本的活動，其要求通商的動機、性質、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開拓殖民地市場，絕對不同。因爲中世的商業資本主義（Handelkapitalismus），乃是資本主義前期的一種形態，尙未經過產業革命，和

工業資本主義之發達，當然更談不上有獨占的財政資本。並且中國權利，在彼時一無損失，而至鴉片戰爭，才開始由領土、軍事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等權利之損失，而成為半殖民地的狀態。

所以鴉片戰爭，即是西歐資本主義開始向中國侵略的結果，亦是中國受西歐資本主義侵略，而開始降落在半殖民地的敘幕。中國老大帝國的酣夢，至是如受當頭一棒，而

社會現象，至是乃開始轉變。本來在鴉片戰爭時所謂先進資本主義的英國，雖然仍保有若干中世商業資本時代的色彩，然英國那時已經過產業革命，到達資本主義的中期——即資本主義發達的盛期，其侵入中國的目的，已不僅爲有無相通，以貨物換現金，以求貿易之平衡，有如中世商業資本主義的性質，而是爲其過剩商品，求得銷售市場，及其所需要的原料，求得源產地；並用國家主義的政策，以固定中國於其支配之下，成爲殖民地的市場（殖民政策，雖在中世，乃至古代，已經開始；然其性質，皆各有不同）。因必須如此，才能達到彼時英國資本主義發達的滿足；亦只有達到這個目的，才能使英國資本主義長足進步。在鴉片戰爭沒有發生以前，英國的經濟及文化（傳教）勢力，已因印度之征服，取西班牙的勢力而代之；及擴大東

印度公司的活動，侵入廣東的香港、廣州、澳門等沿海一帶。這種影響，不但與那時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「自給自足」封鎖經濟政策（Geschlossenewirtschaft），及封建王

國大一統的尊威相妨礙；且其結果，必然使其工業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（Warenewirtschaft）之勢力，破壞了中國的小農經濟及手工業經濟，并與中國固有的壟斷性質的商業資本，亦相抵觸。（如廣州十三行，及中國舊日的貼商、引商等，原是中世商業資本的形態，經過鴉片戰爭，英國即要求取消十三行的獨占權。）所以那時英國與中國滿清政府的衝突，表面上雖是單純的禁止鴉片之輸入問題，實際上則英國資本主義之積極進攻，與代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滿清政府之積極反抗，是整個問題的癥結。

是時英國既挾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，以臨中國；同時，即挾其資本主義的軍事力量，與夫文化知識以臨中國。以代表封建宗法社會的滿清政府，與先進的資本主義英國相抗，宜乎其失敗無疑。中國因失敗的結果，便與英國訂了一個南京條約，這可以說是開中國「不平等條約」的起源。其內容最重要者，第一是賠償軍費暨鴉片損失共二千一百萬兩，割讓香港，開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廣州、上海五港為通商場，規定關稅率值百抽二等；因此，英國資本主

義的勢力，遂得侵入東南各省，作大規模的掠奪，並為其他各資本主義國作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開路先鋒。

三 洪楊之役的發生及其意義

在英國開始侵略中國以後的掠奪過程，所給予中國的影響，便是洪楊之役。許多人以為洪楊之役，與中國歷史上內亂性質相等，其實乃是那時「資本列強」——尤其是英國侵略的結果。如日人稻葉君山氏所著之清朝全史，即謂：「……然從來中國的內亂，普通關於其國內部之歷史，非由外國關係而來；但太平軍之擴大，及其鎮定，則關係於清國與外國之軋轢正多。」此可謂略窺其崖岸矣。我們當進而分析洪楊之役的起源及其意義。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的勢力，已因鴉片之戰、普及東南各省，尤其是廣東；同時美德法各國資本主義的勢力亦追隨於英國左右，開拓其在東南中國的市場。在經濟方面，逐漸動搖固有的小農和小手工業的生產，助長災患的勃發；在政治方面，暴露滿清政府之弱點，無非屈伏在「資本列強」威力之下；以其資本主義所利用的教義——基督教，推入到中國社會，以與舊有的文化相刺激等。其必然的結果，是發動了社會內部的矛盾；而其最顯著的，即以不滿意於滿清政府之無能，

羣視一切資本列強所給予中國的痛苦，均爲滿清政府所召致，乃使封建宗法社會的狹義種族觀念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洪楊之役的動因，最大者爲「排滿復漢」，較之由明末以來所傳的「排滿復明」可以說是一種變化；有許多人遂以爲這是因爲滿清竊國二百餘年，明室爲中心的思想，及明遺老之流風餘韻，蕩然無存，而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下，習與相忘的結果。甚至以這種原因，爲洪楊之役使太平天國底於失敗滅亡的要素。而洪秀全自己，也說他不贊成「排滿復明」，是距明亡太久，人民已忘明室之故。其實由純粹在於忠臣的復羣——復明，進到以漢族爲本位——復漢，本是一種種族思想的進步；尤其是從「排滿復明」到「排滿復漢」，其政治意義，亦更寬廣明顯，與過去的「排滿復明」，大不相同。而其原因，無非一種處在異族（主要是在於列強的壓迫，乃引起對滿清政府的憎惡）壓迫下的種族自覺。這種思想和運動，乃產生在中世封建社會物質條件之上；同時，又是中世封建社會崩潰過程的殘滓。牠的爆發之程度，是與異族壓迫的程度相對比；同時，這種種族觀念之紐帶，是結合在農業經濟發達之時，亦是表現在將要透到資本主義經濟，而使其自身農業經濟基礎將要破壞之時。更具體言之，即是中國以漢族爲本位的種

族思想，是一種農業發達——及商業和手工業發現的產物；牠的發達過程，是相隨着農業爲主體的中世經濟發達的過程之中，一到與異族相抗爭時，自然會表現出來。是時滿清政府與漢族人民，本來各異其種族，所以漢族排滿的思想，自然潛伏。況當漢族受列強之侵略，與滿清政府之壓迫，而居於兩重壓迫之下——尤其是列強資本主義之侵略，使自身經濟基礎，漸漸動搖，故種族思想，很熱烈的爆發了。

況洪秀全所採取之政綱，多帶有原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色彩，這與歐洲十四五世紀的改革宗教運動，同有農民叛亂（*Bauerkrieg*）的意味。換言之，即是反映出當時封建宗法社會，下級農民反抗貴族，及上級社會層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。這種鬥爭的發生，一方面是接收了前期資本主義發達（即商業和手工業）的農業經濟，對封建貴族要求解放的一種表現；一方面又是以列強勢力之侵入，加重農民痛苦，乃促進解放要求，更加熱烈的表現。而是時只要求與異族隔離，未能發生同化異族，把種族鬥爭，變做一種身份的政治鬥爭（如同近代的國民主義思想），和其原始的社會主義之幼稚主張（非現代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），正反映還未發達到資本主義的形態。

我們試看洪楊之役的領袖，多出身兩廣；而洪楊之役的健兒，多爲兩廣的農民。（因那時的下級民衆，佔多數者爲真正農民，及失業遊民的會黨；而洪秀全不注意會黨聯絡，自然其所領導者，多純粹農民。）是因那時資本列強——尤其是英國的勢力，最深入者爲兩廣；換言之，受資本主義之破壞最厲害者，即爲兩廣。而洪楊勢力，僅達長江，亦因爲資本列強的勢力，在彼時僅達長江的明證。北方民衆，則以未受資本列強的侵略，尙在貼然屈伏於滿清政府統治之下，故未受洪楊勢力之傳播。

再由另一方面觀之，滿清政府消滅洪楊，其原因大概在利用曾左彭胡等的力量，及倚賴資本列強——如戈登的洋兵。曾左彭胡等爲那時漢族士大夫的代表，其所憑藉者，亦爲湘省的健兒。士大夫本爲軍事貴族的附屬；一方面係封建宗法制度的擁護者，一方面又係附屬滿清貴族，以求利祿的份子。彼等既不满意於洪楊領導農民的反叛，作一種原始社會主義的鬥爭，以危及於封建貴族勢力的利益。同時彼等所領導的湘省健兒，當時既未受資本列強侵略的影響，復本其遊民無產者（湘軍綠營，多爲會黨）的弱點，多爲反動勢力所利用。因此，乃能視洪楊如元惡大憝，勦滅之以爲快。並且「排滿復明」，雖在士大夫間，乃至下級

民衆的會黨間，彼時猶有傳播，未盡消滅；然這種工作，是一般明朝的貴族朝廷所附屬的官僚、士大夫、及其利用的遊民所固有責任，一至於他們，爲滿清貴族這一個新主人所御用的——尤其當農民起來，反抗上層封建勢力的利益時，當然失其效用。我們試看曾國藩討洪秀全的檄文，固滿紙爲擁護舊的封建宗法制度，及孔子學說，這不啻把洪楊之役所屬於中世農民叛亂的意義，完全反映出來。

因此，洪楊與滿清政府的鬥爭，不但是一種漢族的種族運動，而且是一個農民反抗封建貴族的叛亂，其意義與中國歷史上的內亂，截然不同。至滿清政府，當時依賴漢族之士大夫，以及洋兵，以平洪楊，既表現其已無對付社會變化的能力。而資本列強，假手中國政府的權力，以消滅中國平民的反抗；和漢族士大夫，當着農民與封建勢力的貴族分化時，連漢族爲本位的思想，也置之腦後，反顧事仇，也漸漸具體暴露了。

四 列強之積極侵略

自鴉片戰爭，及洪楊之役以後，資本列強之侵略中國，益爲積極，且所有「資本列強」，爭思染指，進於協同進攻的形勢；同時，「資本列強」的文化、經濟、政治等侵略，

自爲之怯進。一八五三年英法聯軍事件，訂結天津條約，其重要者爲中國承認其傳播耶教，許英法兩國商船航行內河，並許其人民深入內地。除以前所開五口之外，復開牛莊、登州、台灣、潮州、瓊州等商場，納賠償金各二百萬兩。後以清政府不願履行，致英法聯軍入京，咸豐蒙塵，訂立續約（名爲中英和約），其重要者爲中國政府遵照天津條約履行外，復加以英國所借之九龍，讓予英國，允許英國人民，居留天津通商海口，與其他商場同。由中國更出賠償金八百萬兩，其額規定一部份由商埠稅關中提四分之一充之；並且這次和議，以俄國公使伊格拉提夫斡旋之力，由中國割予俄國廣大的領土，作爲報酬。由這幾條條件，已可顯明的看出「資本列強」的勢力，已由中國東南，侵入中國北部矣。

此後復經過二十年内，德、葡和丹等國，都來要求訂立通商條約。一八七四年的中日條約，送掉了琉球島。一八七六年的中英芝罘條約成立，開宜昌、蕪湖、溫州、北海爲通商港，大通、安慶、湖口、武穴、路溪口、沙市等處，准許英輪停泊。承認在中國的英人，不受中國法律的裁判等。一八七七年的伊犁條約，賠款多至九百萬盧布，及允許俄國通商於中國境內，大肆活動。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

爭，中國失敗，訂立中日馬關條約，放棄朝鮮之宗主權，認賠款二百萬兩，割遼東半島及台灣，開重慶、漢口、蘇州爲商埠。次年又訂中日通商條約，許日本以領事裁判權，許日本臣民在中國享受最惠國所享之一切權利，許日本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，來往居住，並從事工商業製造。

日本既以中日戰爭，奏了勝利，由中國得到了各種利益，乃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，一日千里，比較德意志由戰勝法國（普法戰爭）乃形成了中歐的新興大資本主義國，有過之無不及。且以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，形成東亞新興帝國主義的地位，乃更加逐逐於中國的利益——尤其是中國北方，以遂其軍國主義所包含的資本主義侵略之慾求。同時俄國受德法資本的培植，及其本國工業資本之發展，和帝政政府的改革，亦居然具備資本主義大國的規模，由近東侵略之不得志，亦轉而集視線於中國北方。德國則因膠州條約的成立，插足於山東。此外則英國和法國，因中英及天津條約的原故，得從容發展其勢力於北方，固不待言。因此，中國北方，成了「資本列強」紛爭逐鹿的市場；尤以俄國之爭求遼東出路，與日本之西進發展，爲其彼此鬥爭的樞紐。

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成立，允許了俄國的大批利益，使

日本見之眼紅。一八九六年中德北京條約成立，又給予德國以山東的鐵路、蘆山等權利，及租借青島。是年復與俄國訂立租借旅大條約。英國見俄國既在中國北方，大佔優勢，乃要求清政府允許其獨占長江的利益。其內容為揚子江沿岸各省的土地，不得租借割讓他國，開放內河，二年後開長沙為通商口岸，中國總稅務司，永久聘用英人。復於是年，與英訂立威海衛租借條約。繼之有法租借廣州灣，要求廣東、廣西、雲南不割讓他國。英國又續借九龍。日本要求申明福建省沿海一帶，永不租借割讓於他國。從此不但以「資本列強」之割讓及租借土地、索賠償、吸收原料、銷售商品、掠取路權、侵佔航權、攫得關稅管理權、設立領事裁判權，在中國境內，駐扎外兵，淪中國為國際「資本列強」共同榨取的半殖民地；且各設立其勢力範圍，普遍全國，互相競爭逐鹿，使中國廣大的土地及人口，任其宰割。

資本列強之宗教勢力，亦擔任了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使命，為各國資本家作先驅。一切基督教徒、牧師，手捧着聖經和十字架，戴和平的帽子，挾着資本家的金錢，由中國通商口岸，以至窮鄉僻壤，宣揚西歐資本主義的福音。把資本主義的侵略，都變做詩意的行程，去麻醉中國民衆

，以為西歐資本家開闢榨取的舞台。甚或有許多教徒，憑藉其本國的威力，挾制中國政府的官吏，予以特別保護，以魚肉中國人民。同時，又以入教可受特別待遇，為威嚇及引誘一般平民的手段（尤其是天主教多是如此），更可以顯明看出這些基督教徒，決不僅含有文化的作用，而是直接與政治勢力相結托。因此，在清朝光緒年代，有許多教案的發生，結果，不外於中國增加了許多損失。中國民衆，既感上述資本列強積極壓迫之下的痛苦，爆發了狹義的排外思想，於是乃有義和團事件的發生。

五 義和團的排外運動

義和團事件，人多譏為教匪、無意識的暴動，愚笨的行為等；其實無非為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農民，對資本列強侵略的反抗行動。其愚茲行為，不過表示其文化的幼稚，於其本身資本列強的意義，決不可磨滅。以農業社會的人民，與工業先進國的資本列強，在思想上及技術上，整個行動上，固均不足與比較。則義和團除純粹其迷信，以憑肉身之勇，與「資本列強」犀利機械相肉搏外，只有屈服之一途。美洲土人之反抗美國的征服也，印度土人之反抗英國的征服也，非洲土人之反抗英法諸國的征服也等等，

人孰不知其如以卵投石，人孰不誦其愚氓可笑；然而彼等欲保障其種族的生命，除用其固有的社會的產物，以相反抗，那有他途。

義和團之起因，至爲簡單，即反抗洋人耳：羅惇融所作之庚子國變記曰：『光緒庚子，毓賢爲山東巡撫，民間傳習義和團，以扶清滅洋爲幟。時各省多鬧教案，外人逼我甚，民情益憤，聞滅洋說，爭鼓吹之。』是義和團之發生與傳播，直接在於反抗洋人；自然彼等目中的洋人，即是我們現在目中的「帝國主義」，不過以彼時農民意識的幼稚，尚不知洋人自洋人，而帝國主義自帝國主義耳。

因此，義和團事件，固爲中國北方人民反資本列強的奮鬥，毫無疑義。彼等以其行動目的，重要在反抗資本列強，所以排外的感情，勝於「排滿」；亦以這時還是資本列強積極侵略中國的時期，主要是以軍事力量，使中國服從，尙未能以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法則，使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，故中國社會層的分化，不十分顯著。尤其自洪楊之役，滿清政府，已習於藉漢人士大夫及封建勢力的上層，消滅漢族農民的反抗；於是乃進行同化政策，使滿漢兩族，趨於溶合。同時，領導義和團者，多爲一般流氓無產者及地主，其意識是隨時動搖，非與滿清政府，有絕對不同的利

害；故其始初雖與滿清政府爲難（如其圍涿州等），及至慈禧太后與載漪等決定利用以爲同，進攻涿州等），及至慈禧太后與載漪等決定利用以爲制夷之策，遂爲滿清政府效忠。

戊戌政變，本不過一部分士大夫——較開明的，思藉變法圖強，以保全滿清貴族統治中國的特殊利益——換言之，即是維持中國上層封建勢力的統治，而反抗外人的壓迫而已！而義和團事件，則表現這種「排外」意識，已普遍到下級民衆，換言之，即是狹義的排外感情，已深入而普遍化；本是一種進步現象；同時，亦是資本列強積極侵略的結果。有許多人曾以和團有殺燒擄掠，爲舉動野蠻；或指爲匪類之假藉「滅洋」爲題目者。當然義和團之意識迷蒙與行動缺乏紀律和計劃，是一種缺點；但亦爲邇時農業社會應有的產物。況當羣衆爲熱情所鼓舞，發生騷動時，這種行爲，是必不可避免的。我們不能說參加義和團運動之羣衆，俱是抱有「排外」意識的人民，欲在這個騷動裏面專事劫掠；然而如果說這次整個運動目的，在於劫掠，則是非常欠缺常識的判斷。資本列強常以義和團事件，爲中國人民野蠻的佐證，其實真正目的，在鼓吹其征服中國人的教理，而自作其殘酷的侵略手段之飾辭而已！我們試以八國聯軍入北京，原是資本列強，用文明（？）的武力，以懲

謂「蠻的華人」如其統帥瓦德西所說：「……余因而明瞭吾國對華政策（按即指庚子聯軍事件），除對懲罰華人以外，別無特別目的。」然而他又說：「聯軍佔領北京之後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……現在各國互以搶劫之事相推諉；但當時各國無一不有共同搶劫之事實。在英國方面，關於所搶之物，均須繳出，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，加以正式拍賣；如是者累日。其所得之款，則按照官級高低，加以分派，其性質略如戰時掠獲金。因此之故，無一英人，對於搶劫之事，視為非法行動……在日本方面，則掠擄之物，照例歸於國家，其所得之數亦不少。據日本某將軍之報告，只天津一處所掠掠，即有二百萬兩之多。至於美國方面，對於搶劫之事，本來禁止；但美國軍隊，頗具精明巧識，能破此種禁令，為其所欲。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，似乎頗稱粗野，而且同時盡收各物，毫無計劃的打成粉碎。此外法國軍隊，對於各國軍隊之搶劫行為亦復絕對不會落居人後。」又說：「……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，殘忍行為，隨意殺人，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，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。」——見瓦氏所著之拳亂筆記。

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文明國行為的面目，完全揭開了！

最後以這次事件的野蠻（？）舉動，與受文明國（？）武力

懲戒的結果，訂立了一個辛丑條約。其重要者，即派薩親王載灃，親往德國謝罪。肇禍首要，不論王公大臣，或賜自盡，或加流放，或革官職。殺過外人的城市府縣，停止文武官考試五年。外國墳墓被污漬挖掘的地方，由中國政府給建濰垢雪恥碑。中國付各國賠款四萬五千萬兩。在北京劃定使館境界。削平大沽炮台，及北京至海濱間的各炮台。承認各國駐軍黃村、廊坊、楊村、天津、軍糧城、塘沽、蘆台、唐山、昌黎、灤州、秦皇島、山海關等處。頒佈上諭，禁止排外等。中國這種重大恥辱和損失，真不可以筆墨描寫出來。

六 維新運動與開辦實業

當資本列強積極進攻中國之時——尤其是英法聯軍入京咸豐狩熱河以後，其刺激中國上層封建勢力者，可謂至深且鉅；於是在較開明的封建勢力中，乃發生一種「保守不足有為」，打破「夜郎自大」的鋼習，而「圖富強」之術的意識。如康有為所謂：「吾國自古為大一統國，環列皆小國；若緬甸、朝鮮、安南、琉球之類，吾皆鞭筆使之，其自大也久矣……」然而一旦：「我中國四萬萬人，無貴無賤，當今日在覆舟之下，漏舟之中，薪火之上，如籠中之

鳥、釜底之魚、牢中之囚、爲奴隸、爲牛馬、爲犬羊、聽人驅使、聽人割宰、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；加以聖教式微，種族淪亡，奇慘大禍，真不能言者也……」

——見康氏保國會演說辭。這種意識，當封建貴族的統治，受資本列強的侵略時，必然發生；因爲，以資本列強的侵略，破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經濟基礎，和損害其統治權力的尊嚴，這是封建貴族本身利益致命的打擊。所以封建貴族，儼然以代表種族整個利益自居，糾合全體人民——即所謂無貴無賤，——以反抗列強，這即是鞏固其本身利益最好的方法。

是時站在封建貴族的利益上所謂圖富強之術，不出兩途：一是「維新變法」；一是「開辦實業」。這個「維新變法」，係深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；亦後進國家，受先進國家壓迫，所必然發生的一種趨勢。因爲後進國家之封建貴族統治者，要順應世界資本主義潮流，必須一方面維持其利益，而不使之崩潰；一方面以其國家的力量，開發實業，和改革這些不相適合的舊法制，以利於實業之發展。所以後進國家之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多在國家（即以封建貴族爲代表）權力保護下進行。如日本、如德國、如俄國等，皆是這種形勢。而其開發實業，亦多非資產階級或其個人的，

乃在於貴族的政府。而其結果，實業開發，以多依賴政府的指導，乃產生了一切的官僚資本。

故維新變法，決不在於代表資產階級，推翻封建貴族的統治，完成民主革命；而是在以封建貴族利益爲中心。外表上對實業之開發，及法制之改良，彷彿是給資產階級以讓步；而其實際則在更進一步以求穩固其封建貴族統治的基礎。自然他們對於國家富強的簡單概念之下，知道除了「開辦實業」以外，還要求法制的改革，如康有爲所說：「然甲午之後，仍不變法；間有一二，徒爲具文。即如海軍、電線、鐵路、船局、船廠，間效一二；然變其甲不變乙，變其一不變二，牽連相累，必至無成。」差勝一籌。然而其代表的利益，多爲士大夫及豪紳資本公司，彼等既不贊成革命，以免根本動搖其社會層的利益；復思藉此運動，以打破滿清貴族的專制，而使彼等現身朝廷，以爲與滿清貴族平分政權，以建設整個封建勢力的政權，來共同宰制下層民衆，這即是真正的企圖。

我們要明瞭這個運動的意義，既要知道爲資本列強之壓迫所使然；尤須要知道因資本列強之壓迫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層分裂之傾向。滿清貴族所統治者是一個整個的漢族；而在漢族內面所包括的成分，有封建勢力之官僚、士大夫

地主，及商業資本、手工業、和農民等。所以滿清貴族，是與中國整個漢族相對立的；而漢族「排滿」思想，亦由此發生。至資本列強侵略以後，又發生一種官僚資本、買辦階級、及新式工商業者，而籠統構成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，以與封建勢力——尤其是上層的滿清貴族相對抗；而領導了商業資本、手工業、及農民等。士大夫亦起分化，有代表純粹封建勢力的，有代表資產階級的。官僚及地主等，在此自己敵人剛剛起來之時，乃一面向滿清貴族投降，放棄其漢族的「排滿」觀念；一方面又要挾滿清貴族，容納其自身要求，建設開明的專制。這種思想，即以康有為、梁啟超等為代表。

主張「開辦實業」之一派，則多屬滿清政府的官吏，如李鴻章、張之洞等，彼等拋棄其固有的「尊華攘夷」、「保全國粹」、和視外貨為「奇技淫巧」的觀念，居然能窺取「資本列強」工業盛興的法則，用之中國。甚至保守如曾國藩者，亦開製造局譯書、置同文館、方言館、招商局等。公然改換其「深惡外人，蔽拒惟恐不深，而猶傲然自以為得者」的面貌，但「西學為用，中學為體」的主張，以為外人誠富強，苟我能效其術，開辦實業，則亦可步其後塵。然而彼者是現任的官吏，所以對於變法維新毫無注意的必要。

這種以上級封建勢力的利益為中心的「圖強」思想，確是當時現任官吏，和士大夫所同有的。無奈這種希望滿清朝廷圖強的心理，在事實上却完全失敗。因為資本列強已盡掠得中國特權，復分據其特殊勢力範圍；中國欲開辦實業，以及變法圖強的進行，已為資本列強，扼其咽喉，終成夢想。所以「圖強」的導謀未成，而「排滿」的革命風潮，已經發生。

七 排滿運動之發生

「排滿」運動，以同盟會為代表，孫中山先生為領導，而其成分，則有留學生、華僑、及會黨。會黨係遊民無產者的結合，華僑及留學生，則多傾向於代表新興工商業者的利益。要問這些份子排滿的意義，須先研究那時社會層的關係，和其時代背景。那時與滿清貴族對立的，本為漢族之平民；而在漢族平民中，除了士大夫多為滿清政府的附屬外，其他如特殊資本階級的官僚資本、及商人資本、銀行資本等，亦多與滿清貴族相妥協。買辦階級，更成資本列強的奴隸。其餘則為資本列強侵略的刺激所發生的新興工商業、小手工業、小商人。華僑亦為受「資本列強」壓迫而跑到海外謀生的份子，兼現實的受着資本列強不平等的

虐待，而其經濟關係，亦可包括在小有產者的範疇。農民在彼時原係革命的分子，且佔人民中之最大多數；但以文化低落，和小農生產的生活習慣，不能覺悟和團結。遊民無產者，大多係受資本列強侵略，以致失業破產的小農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的化身，故革命性非常強烈，亦確實做了當時革命的先鋒。然以其脫離生產關係，沒有一定的階級意識；故其領袖，多受反動勢力的利誘。地主階級，屬下級封建勢力的主要成份，故多與純軍事支配的上層封建貴族——滿清政府，利益不能一致。尤其因資本列強的壓迫，使她們彼此利害，更距離得遠一些。故彼等可以贊成排滿；然以彼等終屬封建勢力的成分，不贊成革命。留學生固多代表新興工商業的意識，然其出身的社會層，並不一致；所以不是決定革命性質的力量。而新興工商業者，在革命過程中，本應為那時領導革命的階級；然以其本身發展不健全，負擔不起這個使命。至與此相對發生的工人，力量更其微小，不佔什麼重要的地位。

當時因資本列強的侵略，致中國社會發生了動搖，社會層發生了分化；在漢族平民中如新興工商業者的華僑、小商人、小手工業者、農民、遊民無產者等，皆屬反抗滿清政府的成份。甚至地主階級，亦贊成排滿。但其份子複雜

，其政治意識，並不一致。雖然新興工商業之發生，與遊民無產者的要求，有若干民主乃至民生改良的色彩；但其重要，絕不能超過排滿的要求以上。試看那時同盟會的綱領，即是：『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』，而是以排滿做第一位。這種複雜的革命勢力所形成的革命戰線，亦確實只有排滿，可以鼓動一般人的熱情，和集合一切革命的力量。因為那時的排滿，不單純是一種種族思想的表現，而是一種圖強，和反抗資本列強的希望不成的反激——亦即滿清政府不能抵抗外國的一種怨懣。所以與中會的宣言會說：『中國積弱，至今極矣；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，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堂堂華國，不恥於列強；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』又云：『夫以四萬兆人民之衆，數萬里土地之饒，本可發憤爲雄，無敵於天下。乃以政治不修，綱紀敗壞，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然賄賂；……』更曰：『方今強鄰環伺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吾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蠶食鯨吞，已見效於接踵，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。』等等，可見那時排滿的積極意義，無過於圖富國強兵；排滿的消極意義，無過於避免資本列強的侵略，甚爲明顯。再據孫文學說中山先生自叙云：『直至庚子之役，方在民間開始傳播，前此差不多倡排滿

革命者，大家都目爲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。」可見這種排滿之傳播，與八國聯軍，庚子之役，有重大關係。

但是這個排滿運動，有值得注意者兩點：一卽革命的重要成份，以會黨的軍事暴動爲中心。而中山先生以注重代表下層民衆的利益，所以才聯絡會黨，及提出了一「平均地權」的口號。同時中山先生的排滿運動，亦於乙酉中法戰爭的時候開始了。這種注重會黨力量，及代表下層民衆的利益，在當時是最革命的態度；亦因此故，決定了當時革命與改良不同的分野。當時改良派如康梁的保皇黨，以變法爲唯一旗幟者，便是反對同盟會聯絡會黨，及主張民生政策的人。他們的理由，不外於：『利用下等社會，必無所成，而徒荼毒一方；政治革命，與社會革命並行之後，無資產之下等握權，秩序不得恢復，而外力侵入，國遂永淪。』——見朱執信集所引保皇黨機關雜誌新民叢報語。可見當時的排滿，並不真正是以整個漢族做中心，其中還包括有不同的社會層利害，以及根據此不同的利害所發生的不同意識。而真正主張排滿者，乃在於下層的民衆。

八 辛亥革命的前後

在八國聯軍入京，締結辛丑條約以後，復有日俄戰爭，

這在表面上雖爲外人間的衝突，而所損失的却是中國的領土和權利。同時，又有英國積極侵略西藏，與俄國積極侵略內外蒙。資本列強之侵略中國，既然層出不窮；排滿革命的行動，自然再接再厲。雖然在滿清政府的末年，鑑於革命風潮的勃起，及資本列強的壓迫，所謂內憂外患，交相逼迫，不得不在政治上宣佈預備九年立憲的上諭，及在各省由官僚辦什麼資政院，在文化上廢科舉開學堂，以及在經濟上開辦實業等。然而所謂九年立憲的空頭支票，究不能滿足人民的實際要求。學堂之開設，模仿西歐文化，更使人民易於開通風氣，明瞭內政的腐敗。至開辦實業，則不過增加外債的負擔，與一般洋政官員的貪婪，於人民毫無實惠。甚至如以建設海軍名義所搜括的四百萬兩，被慈禧太后移作建築頤和園，以供其個人的娛樂。

在經過資本列強的積極侵略以後，一方面使中國因領土的喪失、賠款的負擔、經濟的破壞、及在政治上、法律上、文化上等權利之損失，已幾陷於永劫不復的地位；而別方面資本列強，却以搾取了中國廣大利益，增進其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，更助長其對中國侵略的勢焰。姑就中國的經濟方面言之，資本列強，既以其威力，使中國的滿清政府，屈服爲半殖民地，又復強制徵收原料，銷售其過剩商

品：榨取過高的利潤，而破壞中國固有的生產。同時，在每次中國軍事失敗以後，必賠償一次鉅款，使中國人民窮於負擔，經濟破產，財政無法維持，又不得不轉而挪借外債，受其榨取利息，及增加賦稅，剝削人民。

資本列強，看上了中國原料豐富，勞力低廉，在中國投了許多資本，開辦工廠、辦理商業公司、交通事業——如鐵路、航線、開採鑛山、培植森林等，縱橫睥睨：到處來吸收中國人的血汗。其結果，封建宗法社會的農業經濟，抵不住資本列強的工商業經濟，漸漸沒落。「手足胼胝」的農業生產，比不上機械犀利的工業生產。一切農業副業的小手工業，更無法立足。「十里洋場」的商店，自然只有資本列強的商品，在那裏橫行；而平常人的衣服用品，亦幾於非洋貨不可。至於一般人民，因經濟破產而失業流落，有誰顧惜？又誰為救濟？

加之，當滿清末季，政府欲實行中央集權，及保障其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，乃將全國鐵路，收回國有，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，向英德法美日五國，借款數千萬鎊，作收回鐵路的基金；以集中於政府支配，最初宣佈收回者，即是川粵漢鐵路。這種行動，很明顯的是企圖控制全國實業中最主要之鐵路之大權，而操掌於滿清政府的手上；然實際

則以借外債關係，使資本列強，暗中操縱，作共同分肥的勾當。然而竟以此惹起下層封建勢力——如地主，及新興工商業者，以及一般人民的熱烈反對。第一個表現，就是以鄂湘粵人民所組織的保路同志會，主張「鐵路民辦」，求各省各界的援助。滿清政府反派兵勦辦，更激起人心的憤激。

保路同志會所要求者，並非出於純粹排滿的種族觀念，乃大半出於一般豪紳資本家的下層封建勢力，及一般工商業者，欲投資鐵路，以開拓其發展的道路。所以四川人民之收回鐵路民辦運動中，竟大大供奉「大行皇帝」——光緒的牌位，而張謇的「實業救國會」，亦通電主張：「實行憲政」、「鐵路民辦」，可見彼等的要求，並沒有排滿的決心；亦以此故，反映當時排滿最熱烈的份子，只有下層民衆——尤其是遊民無產者。

由前述的事實，可見當時排滿的革命運動，本有各種不同的社會層，而最熱烈於這個運動者，只有下層民衆。至若下層的封建勢力（也可以說是右派的資產階級），及新興工商業者，則在排滿與否之中搖擺。但遊民無產者的整個利益，非徹底實行三民革命，完成民生建設，不能解決；然其意識，却非常模糊，易於受反動勢力的利用（例如江

蘇的徐寶山是)。因此，當時雖然又有排滿，可以告這個革命運動的小段落；然而以其排滿的社會層不一致，乃給予新反動勢力——北洋軍閥抬頭的機會。

北洋軍閥本為封建勢力的成份，然與滿清政府不同的，不但以其非滿洲種族，而重要者則為他們是龐大舊封建制度之破壞，純軍事貴族統治的王國之動搖，及資產階級勢力不足起來代替，以建設健全民主政治的產物。彼時下層封建勢力的要求，固然可以產生軍閥政治；而資產階級，亦以恐懼遊民無產者的起來，非藉軍閥來維持秩序不可。況當時資本列強以圖壓迫革命勢力之故，積極幫助北洋軍閥，建立統治的局面。而北洋軍閥亦暗中與資本列強相勾結，以鞏固其利益。因此這種排滿運動中社會層的分化，與反動勢力新聯合的構成，同樣即反映同盟會份子中的分裂。

本來同盟會是各種社會層在排滿大目的之下的結合；然以其利害關係之不同，早潛伏有各個不同的派別。如最革命的中山先生派，準右傾的黃興和宋教仁派，最右傾的章太炎派。除孫中山先生係代表下層民衆的利益外，黃興宋教仁則傾向代表豪紳資產階級，章太炎則很明顯的代表下層封建勢力。並且根本的說來，同盟會的領導者，多屬留

學生的智識份子，沒有堅定的階級立場；所以每因利害當前，而變換其態度。

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，即宣佈「外崇國信」，是其排外的狹義愛國主義，已經忘記了。袁世凱任大總統時，宋教仁更以改組同盟會，為國民黨，主張責任內閣，實行議會政策，以為其妥協的條件。等到袁世凱的地位，稍加穩固，連他們這種條件，也不接收，竟以國民黨為亂黨，而加壓迫，乃有第二次革命之發生。而孫中山先生以不滿意於同盟會右派之妥協，却另組中華革命黨。

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之混亂，固明明表現當時革命的癥結，非排滿可以解決，毫無疑義。至此次革命失敗的責任，半由反動勢力（包括資本列強和封建勢力）之反攻，半由革命勢力內部之分裂，遂致用流血犧牲所拼來的結果，竟為封建軍閥攫取以去。封建軍閥之所以能攫取革命成果，與當時同盟會右派之妥協有關；而同盟會右派之妥協，亦是彼等所代表的社會層所使然。例如當時各省革命偉人，原為同盟會份子，藉遊民無產者軍事暴動的力量，取得軍權政權，便自成一赫然的特殊勢力——如那時的各省的都督——何一非軍閥的胚胎。

第二次革命的意義，即在於「擁護約法」，這個運動，一